

## 李烈 與 陳駿霖

## 暢談《明天記得愛上我》

如果只聽名字，《明天記得愛上我》會給人感覺是一部非常「小清新」的片子，但實際上美籍台裔導演陳駿霖的這第三部長片主題並不算「輕」——它講了同志與異性戀結婚的故事。這樣一個帶有社會議題色彩的婚姻或說愛情故事，在華語世界中相當新穎。陳駿霖也並沒有刻意放大屬於故事中的悲情成分，而是選擇了一種樂觀的方式去處理他的故事。在美國舊金山長大的他，在首部長片《一頁台北》於柏林國際電影節獲得「亞洲電影評審團獎」之後，便迅速成為備受關注的台灣新生代導演。今次，我們便從他的第三部作品，去理解他在電影背後的創作態度。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莫雪芝

李烈，曾主演多部膾炙人口的電視及電影作品，諸如《早安台北》、《小城故事》等等。後來跨足電視製片、演員經紀人。

她在2008年首次擔任電影監製，力捧新生代導演楊雅喆，讓《囧男孩》重現台灣電影許久未見的兒童友情電影類型，在觀眾口碑與電影票房皆獲雙贏。她第二部擔綱製片的黑幫動作類型片《艋舺》，更創下首部台灣片首周破億的奇跡票房紀錄。



陳駿霖常常思考自己想拍的電影類型，其中大多是現代家庭和比較生活化的都市愛情故事，但主觀上又遲遲找不到一個比較有趣的角色，直到他聽身邊的同性朋友說起台灣到現在為止仍然有很多「假婚姻」——男生是gay，但選擇和正常的結婚。這種故事原型中的衝突，為他帶來了一個講述家庭和愛情故事的新焦點。

最終完成的《明天記得愛上我》，和陳駿霖當初的構想一定有落差，他說或許自己希望拍得更完美，但最開心的還是拍出了演員的情緒。「我覺得有些地方不夠完美不重要，這部電影最重要的是人物和角色。」

10年之前台灣的同志婚姻現象比現在多出許多，而這也恰恰是他故事中主人公結婚的那個時代。「但現在如果去gay bar就會發現大家很自由很open，這也是個反差。」陳駿霖認為他的電影主角十年前所做的犧牲，如果放在今天可能便不需要。「但華人社會還是和美國不太一樣。」身在美國多年，他說美國的情況是：「出櫃的事情一定要跟父母講，要向家庭告白。但我在亞洲社會，年輕人雖然已比較開放，台北街頭都能見到男男或者女女牽手，但和父母講的時候，還是不那麼開放。這一點跟西方文化不一樣。」

台灣電影素來不避同性戀題材。但大多數觸及該議題的影片都是典型的「青春同志片」，以成長過程為主線又帶點壓抑和對性向的迷惑。而陳駿霖的男主角是「早就知道自己是gay，10年前就知道。」台灣電影很少講中年的、早就經歷了成長出櫃過程、但「假結婚」後需要考慮是否要二次面對自己性向的gay的故事。

電影取材於現實，那麼現實中的類似故事又是怎樣呢？陳駿霖聽過各種「假婚姻」的版本，其中有一個真的很近似於他電影中的樂觀結局。「那也是一個gay的男生和一個異性戀女生在一起，快二十年，他們的小孩高中畢業時他才跟太太告白自己的性向。他們決定離婚，但真的變成了好朋友，真的非常理性、非常樂觀。」痛苦的故事當然也聽過，沒有哪一個版本一定是對的。電影只是選擇了現實的一種可能性。

## 反正不要想太多

陳駿霖的首部長片《一頁台北》就已經備受關注。而他則認為那部片子是講非常單純的曖昧，所以不可能太深入。「本來就是講比較可愛的愛情，或者說

是城市的一種浪漫氛圍。」但到了《明天記得愛上我》時，他希望大家認同電影中的「他們」就是自己身邊的人。這樣一來「我覺得就比較困難一些。《一頁台北》很風格化，每個角色代表一種風格，這一次，則是希望每個角色都代表一種人。」

陳駿霖當年從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電視系碩士畢業，參與了楊德昌導演的《一一》拍攝。他坦言：「我回來台灣的最大原因是楊德昌導演，正因為第一份電影是跟著他，而且我看了他的很多電影，才決定要回台灣試試看。」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和大師接觸，對這位年青電影人的影響是深刻的。他認為自己作品中有些處理情感和故事結構的方式也和楊德昌相關。「楊導演個性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真的很有導演的氣質。但他的堅持有時會很恐怖，哪怕有些不合理，他還是會堅持。」

楊德昌發起脾氣來很嚇人，但陳駿霖的性格卻完全相反。製片人李烈眼中的他「太nice」。李烈說：「陳駿霖天生是個非常溫和的人，溫和在骨頭裡，你也不要想去改變他。所有和他工作過的工作人員都很喜歡他，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在執行導演這個工作的時候，你根本不用去替他操心、追他的進度，因為他永遠都是那個好學生、乖寶寶會把自己的功課早早做完，你還沒催他，他卻先來催你。」李烈認為和陳駿霖合作這部《明天記得愛上我》可能是自己做監製以來最輕鬆的一部戲——導演早就自己搞定了一切。

更重要的是，李烈認為：「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從第一部到第二部電影之間那種越來越往成熟去走的路向。」

至於陳駿霖自己則認為：「我之前常常會面對兩個衝突，一個是商業跟藝術，另一個是西方跟東方。但我從《一頁台北》學到的教訓就是都不要去想那些——甚麼為了東方觀眾還是西方觀眾……不要想，因為你想太多，它就甚麼都不是了，或者會太刻意偏向一個方向。」如今再去拍一個故事之前，他想的只會是：「這是我想拍的故事，不管是大故事、小故事，也不會首先想着要去拍給誰看。只能說我盡量拍給尊重我、信任我的人，並希望他們會喜歡。」總之就是：「反正不要想太多。」

陳駿霖目前尚未構思好下一部電影會選擇拍怎樣的故事。但初步構思是：「應該是和兩種文化的衝突有關，不一定再去拍愛情片，我想試試去拍一些講別的層面衝突的故事。」

## 李烈：《明天記得愛上我》的幕後推手



李烈是台灣身份最多元的電影人之一。年輕的時候演戲，曾經是家喻戶曉的演藝紅星，近年則開始擔任電影監製，演而優則製、用心扶持新導演。而她每次擔任監製，一定是因為先看了劇本有感受之後才會決定去做。她認為《明天記得愛上我》的劇本是華人地區真的很少觸碰的類型，而在此之外，更有一個非常個人的原因促使她對這個劇本一見傾心。

她坦言：「真正促使我很想做這個的原因，是導演在電影裡面建立的那個男女主角之間的關係。因為我自己十幾年前，有個非常要好的女朋友，碰到過和女主角同樣的問題，發生的事情一模一樣，就是她有一天發現跟她一起生活了十幾年的老公是gay。那每個人碰到這樣的狀況，處理方式都會不一樣，而我的朋友和她的前夫用了一種最糟的處理方式——他們互相傷害、攻擊對方，最後分手時非常不開心，因為兩個人都受傷了。」

悲劇至此並未結束，最可憐的是李烈那位女性朋友的小孩，孩子夾在父母中間，父母雙方又都不願意告訴孩子他們離婚的真正原因。「那個小孩父母都非常疼愛她，但一夕之間整個家都沒了。後來孩子真的蠻慘的，從父母離異之後就開始學壞，變成徹底沒人管，一路我們看着現在已經長到三十幾歲，但整天還是到處鬼混搖搖撞撞。而且小孩一直認為自己變成這樣，是父母的責任。」

所以當李烈看到陳駿霖的劇本時，非常喜歡劇中男女主角處理他們婚姻關係的方式——儘管那個處理方式可能有些人覺得太樂觀。但她認為：「為甚麼不能這樣樂觀地處理事情呢？難道電影裡的他們沒有受傷嗎？有受傷啊，只是大家選擇把傷害降到最低，盡量讓彼此未來的路充滿希望，可以過得更開心一點，這樣不是很好嗎？」她是真的喜歡這戲中結局。「所以說實話，是因為看到那個結局，我就想到了我的朋友。如果當初他們也是這樣，他們的故事就會不一樣。因為我也知道在全世界各地，不只是華人地區，還是有很多同志和異性戀結婚，可能是因為不得已或者別的原因。但無論如何，我會希

望這部電影給他們帶來一絲絲的改變或者影響。」

現在年輕一輩雖然「假結婚」愈來愈少、鳳毛麟角，但李烈所知道的那個generation的很多人，的確選擇過那樣一條路。不過如今台灣社會對同性戀者愈加包容，即使有些父母接受不了兒女是同性戀者這件事，也會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是說你不要在我面前說這個事情，我就假裝它不存在。所以現在年輕一輩的同志們，也沒有太大結婚壓力，他們在自己的生活圈子裡活得很開心。」

李烈始終認為，人生沒有甚麼事情是不可能的。她說：「反而是人生很多事情如果發生在戲劇裡，觀眾會覺得太扯了！怎麼可能！可是人生太扯了的事情，多得很。所以我從來都不會覺得這部電影中給出的結局一定不可能。」

台灣電影這兩年對區外電影人來講，創造的成績是不可思議的。按李烈的話說：「大家會覺得這麼小的一個市場怎麼能創造那麼高的產值？因為台灣電影這兩年票房數字還蠻驚人的。」三四年前，泰國市場電影的年度總票房和現在的台灣持平——但泰國有將近6,000多萬人口，而台灣只有2,300萬。即是在不超過三四年間，台灣遠遠超越了很多地區。

身為監製的李烈表示：「電影它是個商業行為，大家還是看數字嘛，於是人們發現，原來台灣電影在市場上是可以被期待的。」但她指出這同時也是台灣電影的最大問題。「能創造這種數字的電影往往都是非常本土化的，可是那樣本土化的電影註定走不出去，只能在台灣賣。所以台灣電影現在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到底我們要關在自己家裡面繼續創造那個數字？還是希望自己的電影走出台灣？」這也恰恰是近些年她思考最多的東西——如何可以想辦法讓台灣的電影走到國際上去，而不只是大家自己關着門看着數字開心。

而從李烈所監製的《艋舺》、《翻滾吧！阿信》等電影在台灣之外取得的成績，或許便可以看出她的一些有益嘗試。連續的亮眼表現，幾乎令她的名字已經成為一種品牌的保證。故而，未來我們將有更多拭目以待的理由。